

“文明”概念在西方考古学中的应用

马梦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首次出现于18世纪中叶,主要用于表示一种较高的社会发展状况,特指当时的西欧社会。“文明”概念在19世纪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与 modern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考古学内部,不同学者对“文明”的解读和使用也存在差异。早期的柴尔德延续了爱德华·泰勒的用法,即视“文明”和“文化”为同义词,二者可以交换使用,用于表示某个群体的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卢伯克、后期的柴尔德、伦福儒、弗兰纳利等考古学家则对“文明”进行了摩尔根式的解读,用其特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所有社会和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的个体。然而,在如何确认“文明”方面,亦存在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学者尝试通过追踪文明要素在时空中的分布来判断某文化或社会是否已进入文明阶段,另有学者主要从维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社会类型的转变,从而确认文明的起源。随着文化复杂性概念的兴起,“文明”本身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文明的本质。

关键词 文明;概念;范式;考古学理论

1 引言

“文明”之内涵的多样性,使学者能够借力于一个锚点去探究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明”之内涵的模糊性,埋下了文明被滥用的隐患,甚至失去了严肃的学术意义。然而,日常语言中对“文明”的泛用不应该有损于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明”都是一个能够统摄众多研究的有效概念。

“文明”这一概念几乎可见于一切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同学科有时共享着对其的理解,但亦保存着相对独立的研究路径。就考古学内部而言,不同的研究范式对文明的认识存在差异,部分原因在于其核心理论的差异,而这些理论又往往借鉴了考古学之外的学术成果;部分原因则在于该范式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树立了研究典范并被广泛接受。

通过考察“文明”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以及其与考古学的渊源,不仅将有助于澄清目前学界在使用文明概念时所有的龃龉,而且将有助于确认考古学在文明研究中的重要位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内容将限定在西方语境中的文明概念,以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文明的理解和使用上,暂不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收稿日期: 2025-03-17; 接受日期: 2025-11-06

作者简介: 马梦乔,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和考古学理论研究。E-mail: mamengqiao@ucass.edu.cn

2 “文明”概念的产生及其专业化

2.1 “文明”概念的产生和初期使用情况

“文明”概念得以产生的基础是“进步”观念的出现，进步观念则由近代的历史观孕育。在现世进步论之前，西方历史观很大程度上被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犹太-基督教主导^[1]，事物被认为处于固定不变和静态的完满状态，进步从而是不可能的^[2]。18世纪在思想史上发生的一项重大变化，便是进步观念的产生，在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等人身上，我们能感受到最强烈的对进步的信念^[3]。“文明”便在这种思想氛围中诞生。

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文明”一词首次出现于18世纪中叶，最早可追溯到1732年，但其在当时主要还是一个法律用语，与社会状态无涉；该词在1756年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的著作《人类之友，或人口论》（*L'Ami des Hommes, ou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中出现，这是公认的在非司法领域第一次使用该词，用来指代一种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这种社会推崇不断增长的人口、自由和公正；随后，“文明”从法国迅速传遍欧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成为普遍通用的词^[4,5]。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文明”最核心的内容乃是“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主要包括“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6]。这是文明最广为接受的一般性定义。

可以说，18世纪的作家们在使用“文明”一词时带有比较的视角，只是比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种是在欧洲社会内部进行对比，即在以城市为依托的文明与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之间进行对比^[7]；第二种则是将欧洲之外的“野蛮人”作为比较对象，在此情况下文明用以表述一种文雅、教化的状态，从而达到与野蛮、未开化的人群进行区分的目的。这两种用法都蕴含着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即强调世俗的进步^[8]。

2.2 “文明”概念的专业化

文明的概念在19世纪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文明的内涵在逐渐收缩，专业学者对于文明的想法逐渐取得共识，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用法。

在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在法语中开始被用作复数形式，而在英语中复数的用法一直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用以表达某个时期或某个群体的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9,10]。在此意义上“文明”与“文化”（culture）是同义词，因而可以与文化交替使用^[11]。以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为例，在《人类早期历史和发展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一书中，泰勒就使用了“文明”的复数形式（即civilizations）。当他谈到秘鲁和南太平洋诸岛的文明时，实际

上与文化（cultures）所表述的含义并无明显差异^{①[12]}。另外，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对文化的经典定义中，泰勒也将“文化”和“文明”当作同义词使用^[13]。泰勒使用两个不同的术语来表达同一个概念，认为不论是低级的部落还是高级的国家都有文化或曰文明，即文明和文化本身不具有概念上的区分。但是这不代表他认为所有文化或文明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相反，泰勒明确指出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文明或曰文化是可以比较且有高低之分的，只有最后的阶段即欧洲的文明才能代表人类最高的成就^[14]。因此，泰勒只是在词汇上将文明与文化等同，但并未抹杀诸文化或文明之间的等级差异。

泰勒无疑持有社会进化的立场，只不过他并不以“文明”这一术语来指代最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另一种影响较大的用法之一，则是将“文明”视为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往往被认为等同于国家，此种用法极大地影响了考古学。

早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泰勒、摩尔根（Lewis H. Morgan）、巴霍芬（J. J. Bachofen）、麦克伦南（J. F. McLennan）等，都热衷于确立进化阶段。其中摩尔根的工作对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是摩尔根使“文明”获得了用以特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稳定内涵。摩尔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根本就在于由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15]。所谓的“文明”，最核心的表现就是国家这一政治结构。

与18世纪的启蒙前辈们相比，摩尔根对文明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将文明区分为“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和“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认为古希腊、古罗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因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已经拥有了文明的几乎一切要素，包括建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国家、各种民主议会、较为完善的法律，以及最重要的发明——文字^[15]。对摩尔根来说，并非只有新近出现的工商业社会才配称为“文明”，现代文明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因素在个别古代社会中已经具备了，由此野蛮和文明的分界被移至近代之前。

3 从《圣经》到考古学：文明研究的不同范式

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社会起源的解释，自古代开始就有各种版本。基督教诉诸《圣经》上帝，与创造论解释相对立的另一种解释是演化论或曰进化论，其支持者包括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以及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近现代一切相信科学证据的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孔多塞、伏尔泰（Voltaire）等都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史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有时也使用旅行家、传教士、商人、政府或军队人士有关美洲居民的记载材料，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构建仍然是逻辑性大于经验性^[16,17]。

① 原文为 “If we knew of any connexion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f Peru and the South Sea Island”。

与启蒙思想家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物研究。在科学考古学出现之前,物质资料已经被当作历史研究的证据了^[18],自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对建筑、塑像、纪念碑、钱币等古物的研究被视为了解过去社会的有效手段^[19,20]。

虽然古物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成了从主要是独立且分散的个人兴趣到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转变^[21],但正如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所言,古物学者很容易湮没在细枝末节中,而对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漠不关心^[18,22]。古物学家只有克服了他们的浪漫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才能够积极参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讨论,而这正是科学考古学的旨趣。

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之一,考古学在文明话语的构建中属于后来者,但却极大拓展了社会研究的时间界限,弥补了只能通过仅存的原始社会和有限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推测我们祖先生存状态的缺憾。大多数考古学家将文明视作某种高级的事物,但在文明的具体内涵上有龃龉。对文明的不同解释反映出他们研究兴趣的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研究路径,从而构成文明研究的不同范式。

3.1 社会文化进化在考古学中的确立

考古学自19世纪中叶发展为成熟的学科,这与当时欧洲实证科学的兴起密不可分。19世纪下半叶,得益于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成就,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迅猛,极大延伸了人类的古老历史,并且在经验层面上论证了进化的过程^[23]。年代较近的史前考古学则在北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最早在严格的物质材料层面构想了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说”,并经受了地层学的检验^[24,25]。瑞典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斯文·尼尔森(Sven Nilsson)认为汤姆森的石器时代人群是渔猎者,青铜时代人群则是农耕者;特里格(Bruce G. Trigger)指出尼尔森第一次将技术进化与来自启蒙运动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26]。

卢伯克(Sir John Lubbock)是达尔文坚定的追随者之一,致力于在考古学中推广进化论。卢伯克较早认识到“三期说”的重要性,与尼尔森一样,他也不满足于仅仅对史前分期的做法,而认为应该探究当时人群的生活方式,并构筑起人类普遍进化的图景^[27]。

1865年,卢伯克在《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 as Illu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中将文化进化的理论与史前史结合起来,假设社会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28,29]。在另一本著作《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条件》(*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中,卢伯克明确使用了“文明”这一术语,但仅使用了单数形式的“文明”(civilisation)^①,他将文明视为

① “civilisation”与“civilization”是同一单词的不同拼写方式,前者流行于英国和英联邦地区,后者则是美式拼写法。在一般情况下,本文以“civilization”作为“文明”的英文对译词汇,而在涉及具体的文本分析时,本文选择的拼法以原文为准。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而与蒙昧（savagery）和野蛮（barbarism）相区分^[30]。

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泰勒和卢伯克都拥护社会进化论，所不同的是泰勒没有选择将“文明”这一术语拔高，而是将其视为与“文化”可相替换的概念。卢伯克却认为“文明”是最先进和最高级的社会阶段，在此意义上，卢伯克与摩尔根处于同一阵营。

这一在词汇选择上的分野大致被之后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继承。在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学生所发展的美国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是核心术语，且文化之间不可比较^[31]。而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主张将所有古今“文化”都称为“文明”，“文明”之间不可比较^[32,33]。博厄斯和莫斯都消解了卢伯克式的文明概念，认为不同社会及其创造物并不存在高低之分。然而，在考古学中，卢伯克式的文明概念却得到保留，即认为不同文化或社会之间的发展程度是可以比较的，“文明”则是其中发展程度最高的那个或那些个体。

3.2 文明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

对特定地区古代复杂社会的研究，包括西方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等，其研究议题多集中在文字学、文献研究、政治史以及贵族艺术与建筑上^[34]。它们的研究对象多限于人类精神和物质活动的某些突出方面，对文明的这种理解倾向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印记，并深刻地影响到早期的欧洲史前史领域。

史前史研究致力于追溯民族国家在史前的活动，探索欧洲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过程。在众多史前史学家中，柴尔德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性，他对文明的研究自始至终都与其对欧洲族群史前史的关切联系在一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 Civilization*）中，柴尔德对文明的使用还没有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有时他在一种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明，用以表达人类的全部历史，甚至将旧石器时代也包含进来^[35]。在大部分时候，柴尔德视文明为有机的文化整体，但是这个文化整体必须包含“人类文化中的高级因素”（higher elements in human culture），而所谓高级文化因素主要指的是精美陶器、铜器、文字、城市等^[36]。可是，在该书的结尾，柴尔德又交替使用文化和文明来指称同一对象，即较简单的社会^[37]。

柴尔德承袭了一般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文化的概念，但他是通过借鉴科西纳（Gustaf Kossinna）的“考古学文化”概念而间接继承的。考古学文化是人类学文化的史前等价物，用于表示人群的物质特征，进而可代表一种社会传统^[38]。与此同时，柴尔德又保留了卢伯克式的文明用法，即用文明指称一种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阶段，与简单的史前文化相区别。

至于如何定义文明，主要是将已知的古代复杂社会（如古希腊、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作为标杆，从中提炼出文明的要素，并追寻文明要素在时空中的出现。在一篇对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1899年研究欧洲文明起源的回顾性文章中，柴尔德总结出了蒙特柳斯的几个关键观点：文明最早在近东发展起来；文明可以被传播；文明的要素

(elements of civilisation) 由东方传播到欧洲; 史前欧洲文化 (prehistoric European cultures) 劣于同时代的东方诸文化 (Oriental cultures), 也即文明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比在东方晚。柴尔德虽赞同欧洲由史前文化发展出文明应归功于东方文明的传播, 但也指出这一过程是创造性的, 而非对东方文明的拙劣模仿^[39]。在此语境中, 柴尔德严格区分了文化和文明, 后者是比前者更为高级的存在。

将文明理解为某些高级文化因素的集合限制了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解释途径, 此类研究只关心特定类型的遗存, 而忽视了更为基础的、能够反映一般生产和社会活动的遗存。如柴尔德在早期研究中就不怎么关心文明产生的经济基础, 但在后期其研究旨趣发生了变化。

3.3 文明研究的社会考古学转向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 社会文化进化论在人类学领域几乎全线溃败, 这既出于学术的争论, 也由于政治的纠葛。然而, 在史前考古学中依然保留着自启蒙时代以来探究人类普遍历史的热情, 其直接表现就是社会文化进化理论对考古学家依然具有吸引力。

柴尔德的研究兴趣曾发生过重大的转变, 最初他是一个对雅利安有着浓厚兴趣的历史移民主义者 (historical migrationist), 致力于发现印欧人的起源和分辨其原始文化^[40-42]。然而, 在1925—1936年, 柴尔德的关注点转向社会考古。正如上节所提到的, 早期柴尔德对文明的研究着力于追溯文明因素在原始文化中的萌生, 但他也意识到单纯对文明因素的传播进行研究是无法解释文明起源的问题的。后期的柴尔德主要将文明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无可否认, 考古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无视遗存中那些更高级的东西, 但是它必须被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中解读。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 柴尔德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心灵”重新思考欧洲的史前史, 尝试寻求一种对史前史的经济解释, 在《史前期的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最古老的东方》(The Most Ancient East)、《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最古老东方的新认识》(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中可以看到他的转变; 在《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中, 柴尔德采纳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即重视文化变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因, 而非仅仅将技术知识当作主要动力^[43]。在此意义上, 柴尔德超越了他之前对技术的片面强调, 而能从更宽阔的政治经济视野考虑问题, 由此完成了社会考古学的转向。

柴尔德曾从社会考古学的角度提出最早的城市应具有的十项基本特征, 这也是最早的文明应该具备的^[44]。对柴尔德而言, 技术不再是划分社会类型和社会阶段的单独因素, 而必须综合考虑技术的应用场景, 即食物生产和再分配系统的情况。依据基础经济, 柴尔德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食物采集 (food-gathering) 的社会、新石器时代采取食物生产 (food-production) 的社会, 以及经历了所谓城市革命的阶级社会。柴尔德保留了摩

尔根和恩格斯所使用的术语，即分别以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指称三种类型的社会，但他宣称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并没有隐含的轻蔑意味^[45]。

几乎在同时，将文明主要解释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情况在北美也有复兴的迹象，并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考古学有关文明的阐释模式。

3.4 社会进化论的复兴与酋邦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进化论者所持有的单线进化立场在其曾经一度流行的北美和英国受到了批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似乎认为博厄斯已经摧毁了进化论在北美的根基^[46]。进化论虽盛况不在，但依然保留着火种。20世纪中叶新进化论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中异军突起，恢复了进化的地位，极大影响了考古学对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范式。

怀特（Leslie A. White）和斯图尔特（Julian H. Steward）为新进化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怀特的文化演变观是技术唯物论的，强调人类支配自然力和能量的能力^[47]。斯图尔特则持有生态的文化观，他认为文化乃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满足生存需求的手段，类似的文化生态适应导致类似的历史发展过程^[48]。

怀特和斯图尔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了一批拥护者。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和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将二者的观点综合起来，区分了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49]。塞维斯和弗里德（Morton H. Fried）对古典进化论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进行了更细节化的研究，各自提出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band, tribe, chiefdom, state）^[50,51]和“平等社会—阶层社会—阶级社会—国家”（egalitarian society, rank society, stratified society, state）^[52]的发展序列。

新进化论对古典进化论做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抽象的社会发展序列外，增加了历史的维度，考虑到了个体社会适应的多样性；第二，对术语和概念的澄清。如塞维斯将蒙昧人（savages）、野蛮人（barbarians）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意味的概念驱逐出学术研究的场域，同时保留了“原始”（primitive）概念的合法地位，用以表示简单的（simple）、早期的（early）、原初的（original）、初级的（primary）社会，其根本特征在于“缺乏发达的政府机构”^[53]，与原始社会相对的则是“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54]。不过，无论是塞维斯还是弗里德，都没有选择使用“文明”（civilization）来指称他们序列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state”（一般译为“国家”）。这应与他们对文明的特殊理解有关。

以塞维斯为例，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中，他区分了“现代原始国家”（modern primitive states）和“古代文明”（archaic civilizations）。这种区分应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因为塞维斯承认没有办法从考古学上将国家和酋邦阶段区分开来，因而他使用“古代文明”来指称与分节的原始社会明显不同的等级社会，但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只能肯定它在进化链条上比酋邦更进一步，但是否属于经典意义上的国家，则缺乏充分的考古

学证据^[55]。总体而言,塞维斯将现代原始国家和古代文明都视为比酋邦更高级的社会类型,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等同。

与人类学家塞维斯不同,考古学家似乎更青睐“文明”这一术语。以受到新进化论启发的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为例,他曾从考古研究的角度界定了文明的内涵。他认为不可数的文明(civilisation)可用于指代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stage)、层次(level)或状态(state),而可数的文明(a civilisation或civilisations)则表示考古学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即“一组人群共享的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某种特殊的适应形式”^[56]。文明隶属于文化,但并非所有文化都可以称作文明,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在于其特殊性。

进一步而言,伦福儒认为所有文明都应该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包括手工业的专门化(craft specialization)以及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等;反之,任何满足了以上条件的文化则都可以被称作文明^[57]。在对文明内涵的阐释上,伦福儒并无创新之处,但是伦福儒严格限制了在考古学语境中对文明的使用,避免了术语层面上的混乱。

此外,伦福儒认为塞维斯所提出的“酋邦”(chiefdom)概念对分析爱琴海地区最早出现的文明非常有效,因为这些在晚期青铜时代已经步入文明阶段的社会比部落社会要复杂,但又缺乏成熟的国家社会的某些关键要素,而酋邦恰能涵括这一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状态^[58]。有理由相信,对伦福儒而言,文明和酋邦大体上指的是同一类事物,只是前者更侧重于社会性质“文明/非文明”的二分,后者则强调具体的社会类型。

3.5 文明的考古学研究:新趋势

目前仍然关心社会文化宏观变化的考古学家大都承认“社会文化进化”(sociocultural evolution)是一个有效的科学概念,即假定某些复杂程度较低的社会将进化到更复杂的形态^[59]。在此情况下,“文明”仍然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有着真实的科学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提出了新的概念来统摄进化过程。

弗兰纳利(Kent V. Flannery)是借助复杂系统思考社会变化的开创者之一,他曾提出“社会政治复杂性”(sociopolitical complexity)的概念,将文化进化的过程视为复杂性增加的过程,并以“分隔”(segregation,即内部分化和子系统的专业化程度)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即各子系统与社会最高阶控制之间的联系程度)两个变量衡量社会的复杂程度。与此同时,弗兰纳利依然认可塞维斯确立的四种社会类型或曰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并承认“文明”概念的有效性,但只在确定的情况下使用,即用于指代那些往往伴随特定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即国家)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综合体(complex of cultural phenomena)^[60]。如果以复杂性衡量,“文明”无疑是社会政治复杂性水平相当高的那些文化。

复杂性理论对文明研究的贡献之一,在于使用了同一套指标衡量文化系统,将由简单到复杂的社会串联了起来,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前的非农业群体,从而将文明起源研究

的起始点前置到农业起源之前。在以往的研究中,狩猎采集人群常因缺少文字、冶金术、城市等明显的文明要素,被贴上“原始”或“野蛮”的标签。但研究者发现,狩猎采集社会也能发展出高度复杂的文化,而在以往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中,这些群体因迥异于定居农业或国家社会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61]。

普莱斯(T. D. Price)和布朗(J. A. Brown)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史前狩猎采集者——文化复杂性的出现》(*Prehistoric Hunters-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即是此类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们认为,在晚更新世尤其是冰后期早期,各地区和不同环境中的食物采集人群都体现出日益复杂的特征。该论文集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俄罗斯中部平原和法国西南部、中石器时代的西北欧、近东的纳吐夫文化、公元前2500—前1000年美国肯塔基州西部的渔猎采集者、公元800年至接触时代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以及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近4万年来的人类居住史。这些案例研究证明了一个核心观点,即文化复杂性是狩猎采集群体在常规进化过程中会出现的全球性现象,而非特例^[62]。

与弗兰纳利不同,普莱斯和布朗质疑了塞维斯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会类型划分方案,认为其可能导致视角的机械化^[63]。此外,该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没有直接使用“文明”一词,应该隐含了作者们对该概念的不赞成,因其与划分社会类型或阶段的做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4 讨论与结语

“文明”一词首次出现于18世纪中叶,核心用法在于表示一种较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状况,隐含了西欧社会对于当时所取得成就的骄傲情绪。在19世纪,“文明”概念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其内涵和用法也渐趋稳定:在某些情况下,“文明”被当作“文化”的同义词,因而可以与“文化”交替使用,用于表示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影响较大的用法是将“文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或最高阶段,或是所有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的某个或某些个体,该用法认为人类社会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且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

在考古学内部,“文明”的使用情况也呈现出复杂的场景。有时学者并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应用场景做出限制,如早期的柴尔德就延续了泰勒式的用法,即视“文明”与“文化”为同义词。但对社会文化进化立场更明确的学者而言,如卢伯克、后期的柴尔德、伦福儒、弗兰纳利等,“文明”具有明确的内涵,即用于表示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或水平(不可数的文明),或是特殊类型的社会或文化(可数的文明)。

对于如何确认某社会或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或已经属于文明,存在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研究路径受西方古典学、埃及学等影响,视古代社会中的伟大遗存为文明的必备要素,这些遗存被认为能够代表全体人类最高的精神成就,为评估其他地区社会文

化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判断标准。早期关心欧洲民族国家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史前史和史前考古学者,将已知的古代复杂社会(如古希腊、古埃及和近东地区特定时期的古代社会)所具有的某些文化现象(如冶金术、文字、纪念性建筑等)当作文明的必备要素。通过对这些要素的寻找,确认了欧洲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节点。这一研究范式又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仿效,后者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若干个古代文明,它们被认为是各自地域内最早出现的复杂社会,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这类研究蕴含的社会进化观是模糊的,其对文明要素的选择多出于研究者的直觉,具有追求“伟大”的审美倾向,但对于更基础的内容,如生计方式,大都兴趣寥寥。

第二种研究路径主要将文明理解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产生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同时,研究者试图在内容上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或文化。文明要素本身不再是讨论的焦点,其所反映的生计方式的转变(主要是农业起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等成为学者最关心的议题。

现如今“文明”概念的合法性常遭到质疑,一方面是由于它与政治纠葛太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文化进化论本身在解释历史变化问题上存在局限。社会阶段论会导致在研究中忽略那些离文明阶段还存在较大距离的人群,而以复杂性理论解释社会变化,则对这一可能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矫正的作用,甚至有消解文明概念本身的倾向。复杂性的概念模糊了文明与非文明的界限:社会与社会之间似乎只在复杂性这一维度上存在程度差异,而不具有阶段或类型上的不可逾越性。社会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实质性,或者社会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质迥异?所谓的“文明”是否真的就是在不久之前才产生的,以及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区别于其他所有社会类型的“文明”?这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 [1] 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M]. 李秋零, 田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 洛夫乔伊. 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M]. 张传有, 高秉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27.
- [3] 孔多塞.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 何兆武, 何冰,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2.
- [4] 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M]. 肖昶, 冯棠, 张文英, 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3-24.
- [5] 马兹利什. 文明及其内涵[M]. 汪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4-15.
- [6] 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M]. 王佩莉, 袁志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
- [7] 赖国栋. “文明”与时代的交互[C]//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廑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 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2013: 321-330.
- [8] 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47.
- [9] 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M]. 肖昶, 冯棠, 张文英, 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6.
- [10] 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49-50.
- [11] KROEBER A L, KLUCKHOHN C.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 Cambridge,

- Mass.: Peabody Museum, 1952: 13.
- [12] TYLOR E B.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M]. Boston: Estes&Lauriat, 1878: 203.
- [13]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M]. London: J. Murray, 1920.
- [14] STOCKING G W. Matthew Arnold, E. B. Tylor, and the uses of invention[M]//STOCKING G W.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69–90.
- [15] 摩尔根. 古代社会[M].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6] CHAPMAN R. Archaeologies of complex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3: 5.
- [17] APPIAH K A. Digging for utopia[J].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21, 68(20): 80–82.
- [18] MILLER P N. History and its objects: antiquarianism and material culture since 1500[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 [19] 莫米利亚诺.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M]. 冯洁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4–88, 90–91.
- [20] 布罗. 历史的历史: 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M]. 黄煜文,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9.
- [21] SCHNAPP A. Between antiquarians and archaeologists—continuities and ruptures[J]. Antiquity, 2002, 76 (291): 134–140.
- [22] 莫米利亚诺.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M]. 冯洁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99.
- [23] VOGEL F W. A history of ethnology[M]. New York: Holt, Rinehart&Winston, 1975: 118.
- [24] HEIZER R F. The background of Thomsen's three-age system[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62, 3(3): 259–266.
- [25] DANIEL G E. The three ages: an essay on archaeological method[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 9.
- [26] 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M].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04.
- [27] PATTON M. Science, 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the work of Sir John Lubbock: a man of universal mind[M].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54–55.
- [28] 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M].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35.
- [29]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9: 187.
- [30] LUBBOCK J.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M].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870.
- [31] 路威. 文明与野蛮[M]. 吕叔湘,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32] 涂尔干, 莫斯.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M]//施朗格.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 蒙养山人,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36–40.
- [33] 王铭铭.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 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J]. 社会, 2018, 38(4): 1–53.
- [34] 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M].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53, 57.
- [35] CHILDE V G.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25: 1.
- [36] CHILDE V G.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25: xiii, 22–23.
- [37] 特里格. 柴尔德: 考古学的革命[M]. 何传坤,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59.
- [38] 帕特森. 马克思的幽灵: 和考古学家会话[M]. 何国强,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82.
- [39] CHILDE V G. The Orient and Europe[J].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39, 43(1): 10–26.
- [40] 特里格. 柴尔德: 考古学的革命[M]. 何传坤,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47.
- [41] BRAMI M N. The invention of prehistor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Europe: exploring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Gordon Childe's "Neolithic Revolution" (1936)[J].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19, 32(4): 311–351.
- [42] CHILDE V G. Retrospect[J]. Antiquity, 1958, 32(126): 69–74.
- [43] TRIGGER B G. Childe and Soviet archaeology[J]. Australian Archaeology, 1984, 18(1): 1–16.
- [44] CHILDE V G. The urban revolution[J].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1950, 21(1): 3–17.
- [45] CHILDE V G. Early forms of society[G]//SINGER C, HOLMYARD E J, HALL A R. A history of

- technology,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38–57.
- [46] 哈定, 卡普兰, 萨赫林斯, 等. 文化与进化[M]. 韩建军, 商戈令,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1.
- [47] 怀特. 文化科学: 人和文明的研究[M]. 曹锦清, 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346.
- [48] 史徒华. 文化变迁的理论[M]. 张恭启, 译.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
- [49] SAHLINS M D, SERVICE E R. Evolution and cultur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 [50] SERVICE E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51]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M]. New York: Norton, 1975.
- [52] FRIED M H.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 [53]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M]. New York: Norton, 1975: 4–5.
- [54]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M]. New York: Norton, 1975: 5.
- [55]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M]. New York: Norton, 1975: 303–305.
- [56] RENFREW C.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M]. London: Methuen, 1972: 3–4.
- [57] RENFREW C.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M]. London: Methuen, 1972: 4–5.
- [58] RENFREW C.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M]. London: Methuen, 1972: 363–364.
- [59] 崔格尔. 理解早期文明: 比较研究[M]. 徐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1.
- [60] FLANNERY K V.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2, 3 (1): 399–426.
- [61] ARNOLD J E. The archaeology of complex hunter-gatherers[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6, 3(1): 77–126.
- [62] BROWN J A, PRICE T D. Complex hunter-gatherer: retrospect and prospect[M]//PRICE T D, BROWN J A. Prehistoric hunters-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435.
- [63] BROWN J A, PRICE T D. Complex hunter-gatherer: retrospect and prospect[M]//PRICE T D, BROWN J A. Prehistoric hunters-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436.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n Western archaeology

MA Mengqiao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he term “civilization” first emerged in the mid-18th century, primarily denoting an advanced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in reference to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of that period.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the concept underwent a process of specializatio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in archaeology, scholars have interpreted and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n divergent ways. Early scholars such as V. Gordon Childe followed Edward Tylor’s approach, treating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as synonymous and interchangeable terms to describe the shared characteristics of a group’s way of life. In contrast, archaeologists, including Sir John Lubbock, the later Childe, Colin Renfrew, and Kent Flannery, adopted a Morgan-esque interpretation, using “civilization” specifically to refer to the highest stage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or the most advanced entities among all societies and cultures. However, differing research approaches exist regarding how to identify “civilization.” Some scholars attemp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culture or society has reached the stage of civilization by trac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key elements of civilization, while others focus on subsistence economi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to examine transformations in societal types, thereby identifying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mplexity, “civilization” itself faces the risk of being dissolved as a distinct category, prompting researchers to reconsider its essential nature.

Keywords civilization; concept; paradigm; archaeological theory